

ZHONGGUO SHHAOSHU MINZU GUDIANTU WENXIANXUE

中国 少数民族 古典文献学

朱崇先 主编

朱崇先 李生福 张铁山 编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精品教材建设项目

中国
少数民族
古典文献学

朱崇先 主编

朱崇先 李生福 张铁山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朱崇先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5

ISBN 7 - 105 - 07029 - 3

I. 中... II. 朱... III. 少数民族 - 古文献学 - 中国
IV. G2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136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 010 -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前 言

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曾创制使用过三十余种文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开发利用前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掀起了大规模收集整理民族古文字文献及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领导机构和科研单位，建立了一支粗具规模的专业队伍。二十多年来，有关民族院校已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充实到各级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部门，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需求。因为民族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进行上百年的长期工作，所以培养民族古典文献学专业人才已成为民族院校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以往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普查、搜集、保存等环节，于是大学本科专业课的教学重点就相应地放在认识、了解民族古籍文献基本面貌和流传、收藏情况方面。我校曾编写过《民族古文献概览》一书，作为专业主干课的重点教材。随着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21世纪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对民族古籍的评点、校注和翻译、研究上来。因此，既要提高现有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更需要培养高层次的古典文献学专门人才。为了配合新时期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我们陆续开办了研究生班，让在职的专业人员进行深造。与此同时，还需要不断招收博士、硕士

研究生，在专业课程设置和教材配备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如何有效地学习和掌握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因而，编写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作为民族古典文献专业的主要教材，是当前和今后培养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高级专业人才和加强民族古典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需要。现有的文献学论著大多数以汉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为对象，极少涉及少数民族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甚至有些论著丝毫不提及少数民族古文献；而一些少数民族文种的文献学则局限于本文种的文献范围之内，没有顾及其他文种。近些年虽然有一两部民族古籍学论著问世，但是对古籍研究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或涉及文献学基础知识甚少，不宜作教材，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书。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以“民族古典文献学”为题的论著和教材。再说，以往我国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建立在个别文种文献的整理研究基础之上，难免有其局限性。尽管有些文献整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以用来指导各种少数民族古文献的整理研究，但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和体例，则必须根据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实际，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总结。因此，编写一部全面展示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和系统反映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著作，既是古典文献专业教学的现实需要，又是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迫切要求。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于2002年被列为中央民族大学的“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由语言文学学院语言文学系民族古籍文献教研室组织实施。为了确保此书的编写质量，我们对编写体例和内容及其学术特色及理论创新方面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描述古典文献要突出多文种、多语种和不同地域古典文献的特色。尽可能使近三十个文种的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分别得到不同程度的列举和介绍，从而全面展示民族古典文献的基本面貌。

二、在理论和方法上坚持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借
· 2 ·

鉴中国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以及训诂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传统文献学知识，广泛借鉴现代有关学科（如普通语言学以及词源学、文化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的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结合民族古文献的特点和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实，建立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三、在篇章结构的设计与安排方面，不是简单地套用其他文献学论著的构架，而是根据民族古典文献的实际情况和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特殊需要，按照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原则安排篇章结构，以便读者逐步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民族古典文献的基本面貌并掌握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

本书编写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朱崇先：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一章；

李生福：撰写第三章、第十章；

张铁山：撰写第四章、第六章；

杨怀珍：第五章（第二节）。

朱崇先负责全书的统稿和编务工作。

经过各位作者的齐心协力，终成此书。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虽然数易其稿，但是其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学界也正在探索之中，似乎还不够成熟，因各章分别完成，难免有重复的地方。尽管我们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仍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科研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提高和完善。限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匡正和赐教。

编者

2005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	(2)
第二节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	(6)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性质和任务	(16)
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	(24)
第二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与古文献的 源流及其特点	(38)
第一节 民族古文字的创制及其源流	(38)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产生和发展	(47)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基本特点	(61)
第三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 积聚与散失	(66)
第一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传播与积聚	(67)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损坏和散失	(75)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征集和收藏	(80)

第四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载体种类 及其特点	(89)
第一节 碑碣石刻及其特点	(89)
第二节 金属铭文及其特点	(96)
第三节 简牍缣帛文献及其特点	(104)
第四节 纸质文献及其特点	(105)
第五节 古典文献的现代载体及其特点	(113)
第五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分类 与编目著录	(117)
第一节 民族古典文献分类的历史与现状	(118)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分类编目与著录	(144)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科分类原则 与列目归类	(158)
第六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版本 与装帧	(163)
第一节 民族古典文献版本的内容和功用	(163)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版本的鉴别方法	(166)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装帧种类及其艺术	(181)
第七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校勘	(195)
第一节 民族古典文献校勘的重要性	(195)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校勘的基础知识	(198)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校勘的基本形式和方法	(205)
第八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翻译和注释	(222)
第一节 民族古典文献翻译注释的基本原则	(222)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翻译的步骤 及其方法与技巧	(234)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翻译注释的 体例及其应用	(240)
 第九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与 其他学科的关系 (246)	
第一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与语言学和 文字学的关系	(247)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与民俗学和 民间文学的关系	(249)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与民族学和 考古学的关系	(254)
第四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264)
第五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与民族史学和 自然科学的关系	(266)
 第十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调查 (275)	
第一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调查的目的和意义	(276)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调查的基本方法	(281)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学调查提纲的 制定与纲目体例	(285)
 第十一章 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保护与 开发利用 (292)	
第一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抢救与保护	(292)
第二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转移方式与再生技术	(302)
第三节 民族古典文献的开发前景与利用价值	(312)
后 记	(320)

第一章 絮 论

我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先民都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载于各民族的历史文献与文化典籍之中，传于后世，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各民族历史文献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记载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涉及各个学科领域。

很早以来，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便不断地对前人的文化遗产加以整理和利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前发展。以汉文典籍为例，司马迁的《史记》对汉代以前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文献记载和传说作了很好的梳理和载录；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编撰《七略》，为后世子孙了解汉代以前的古籍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永乐大典》等文献集成，更是提高了后人阅读和利用古文献的效率。历代注疏家的经籍注释和解说工作对文献典籍的传承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清代考据学家倾心于“征文考献”，在古典文献的研究与考证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历史上，汉文典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既如此，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也不例外。如藏文文献学家把藏文佛经整理成《甘珠尔》、《丹珠尔》两大部分，彝文文献学家把诸多彝文历史文书和天文、地理、哲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文献整理成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夜郎史传》等。据我国民族古籍整理研究部门的初步

普查登记，目前存世的民族古籍文献多达四五十万种。这一文化遗产，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提供丰富、翔实的古代文献资料。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学术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把炽热的目光投向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党和国家十分注重古籍整理工作，在民族古籍整理和民族古典文献的翻译、研究方面，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二十多年来，通过各民族古籍文献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章对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有关情形进行分节论述。

第一节 丰富多彩的中国 少数民族古典文献

从秦汉以来，汉族知识分子用汉文记录了诸多少数民族地方的情况，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也用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写下了本民族的著作。在这些遗留下来的古典文献中，既有关于物产、交通、气候等方面的资料，也有关于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记录，还有一些是带有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的文学艺术著述，这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珍贵财富。要系统全面地了解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可从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民族古典文献、用汉文记录的民族古典文献、口耳承传的古代民族文史资料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民族古典文献

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曾经使用过三十余种民族古文字，留下了古彝文、纳西东巴文、古突厥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

满文、古壮文、古布依文、傣文、瑶文等诸多文种的古典文献。

从目前各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来看，国内外的一些著名图书馆，以及民族地区的省市图书馆和各大专院校图书馆、科研单位的图书馆、资料室、寺院等，分别藏有各文种的大量古籍文献。如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民族古文献就有藏、蒙、满、彝、傣、纳西等诸多文种，其中不乏珍贵的文献或已绝版的书籍；如藏文《大藏经》之纳塘版《甘珠尔》部、《多仁班智达传》手抄本、《贤者喜宴》初印本、宁玛派契经《伏藏》，蒙古文《蒙文汇书》、蒙汉合璧《圣谕广训》，满文《盛京赋》，彝文《西南彝志》，傣文《德宏傣文》手抄本等等。除此之外，该馆所藏的 1153 种拓片涉及多种古文字^①，也是非常珍贵的民族古典文献。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特藏的民族文字古籍和碑文拓片、档案文书等甚多，所包括的文种亦达十余种。

许多文种的古籍文献分别被国内外的图书馆或研究单位、寺院收藏。以藏文古典文献为例，据初步调查，数量和种类都蔚为大观。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 20000 多函 100000 多册，哲蚌寺收藏近 10000 函，萨迦寺收藏近 6000 函。又如甘肃省约有藏文古籍 17886 种，73507 部（函本）。仅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就收藏约 60000 部（册），可分为全集、哲学、密宗、医药、声明、历史、传记、天文历算、工巧、数学、诗学等十多类。其中全集类 177 种 21320 部（册），哲学类 15411 部（册），传记类 1931 部（册），声明类 249 部（册），文法诗学类 561 部（册），天文历算、工巧类 280 部（册），医药专著 495 部（册）。

二、汉文记录的民族古典文献

记录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方情况的汉文古典文献极为多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志就多达

^① 陶风珍撰：《试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的特色、价值与利用》，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6）。

3200 种，约占全国现存方志 8264 种（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的 38.5%。其中内蒙古地方志 41 种，宁夏地方志 9 种，青海地方志 8 种，新疆地方志 78 种，广西地方志 58 种，贵州地方志 66 种，云南地方志 125 种，西藏地方志 44 种。有的版本极为珍贵，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仅有，如《江川县志》清光绪抄本、《新疆四道志》抄本、《开化府志》抄本。历代文人、史圣的著作中，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及少数民族地区风情为著述内容的不乏其例。

以云南地方文献而论，由于前人的重视和辛勤劳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传》专载云南地方民族史事以来，前、后《汉书》及此后的历代史籍都对云南的地方史事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做了比较系统的记录，形成诸多专书，或者分散载录于各“传”、“志”中。例如：编年史《通鉴》、《明通鉴》等，政书《文献通考》、《通典》、《通志》、《会典》等，都对云南的历史、地理、民族风情等诸方面作了系统的载述。个人著作中有关云南历史及各少数民族情况的记载就更多了，最著名者有东汉杨终的《哀牢传》，晋代常璩的《南中志》、李充的《云南风俗记》，唐代袁滋的《云南行记》、韦齐休的《云南行记》、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樊绰的《蛮书》、窦滂的《云南别录》、韦琅的《云南事状》，宋代辛怡显的《云南录》、邓嘉犹的《西南备边志》，元代张道宗的《记古滇说》、张立道的《云南风土记》、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韩宜可的《云南稿》、彭纲的《云南总志》、杨慎的《滇载记》、诸葛元声的《滇史》、谢肇淛的《滇略》、徐霞客的《滇游日记》，清代冯甦的《滇考》、毛奇龄的《蛮司志》、谢圣纶的《滇志略》、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倪蜕的《滇云历年传》等等。另有记载各民族及南诏、大理的专著如明代钱古训《百夷传》，阮元声《南诏野史》，顾应祥《南诏事略》等。其他有关云南民族、山川、物产、边事、艺文、古迹等各方面的专书，以及有关滇事的杂记、随笔、滇人著作的别集、总集等就更多了。

元代三部农书之一《农桑衣食撮要》是畏兀儿人鲁明善在

安丰路（今安徽寿县）任肃政廉访司官员时撰写的，于元延祐元年（1314年）出版。该书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对于农业生产有很强的指导性。修撰辽、金、宋三史，是元代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相继在中国北方统治了一个世纪以上，而汉族建立的宋王朝虽然前后统治三个世纪，但始终未能统一全中国，“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年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参加修撰三史的有蒙古人、畏兀儿人和汉人。《元史》、《清史稿》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记载了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①

总的说来，我国的各种汉文史籍及各有关省、县地方志中设专门章节著录或者论及各民族历史文化者甚多，不胜枚举。

三、口耳承传的古代民族文史资料

除了各民族丰富的文化典籍之外，我国口耳承传的古代民族文史资料也异常丰富。无文字的民族，其历史文化主要依赖于口耳相传和世代承袭；有文字的民族，其历史文化可以用文字记录，但口耳相传的内容和范围往往超过文字的记载。事实上用民族文字记录的古典文献中，远古神话和创世史诗等无疑是根据远古先民口耳相传的文史资料整理记录的，就是有些民族的英雄史诗，口传的范围也比书面传播更为广泛，例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虽然有多种手抄本和刻本传世，但是至今仍以口头传唱为主。有些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如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有多种彝文手抄本传世，但传播范围远不及民间口头传唱那么广泛。文史著作的内容，同样存在双途径传播的情况。如百科全书式的彝文名著《西南彝志》所辑录的许多文史资料，就是当口头传唱的古歌唱词。有文字的民族既如此，无文字的民族就更不待言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一切社会实践积累的知识，以及创作的文学作品，无不用口耳相传的方式继承和传播，这使得我国

^① 参见李杰著：《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探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各民族的口传文史资料的丰富程度远远超出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没有文字的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要靠口耳相传，他们通过代代承袭的传唱方式保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正如侗歌中所云：“古人讲，老人谈，一代一代往下传；树有根，水有源，好听的话儿有歌篇；没有文字好记载，侗家无文靠口传。”其实，汉文文献早期也是靠口耳相传的。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在古代便是史料，过去学者将古代的传说和当时文人、学士的言论与书本记载并重，也是有道理的。以此论之，少数民族古典文献除了典籍文书之外，还应该包括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口传文史资料。在各民族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诗歌、寓言、故事、谜语之中所包含的文史资料中，如苗族民间传唱的《苗族古歌》、侗族民间流传的《起源之歌》、彝族民间演唱的《梅葛》、《阿细的先基》，佤族民间传唱的《司岗里》，哈尼族民间传唱的《奥色密色》，拉祜族民间传唱的《牡帕密帕》，瑶族民间传唱的《密洛陀》，水族民间传唱的《开天立地》，景颇族民间传唱的《穆瑙斋瓦》等，都被各民族视为自己的历史。其间虽然有一些神话成分，但是也包含着许多具有文史资料价值的内容，无疑是研究各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

第二节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 少数民族古典文献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是正视我国国情，客观考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需要，也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需要。中华民族的统一历史是各民族共同谱写的，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各民族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大量民族文字典籍和古文献资料曾经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必将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正确认识和对待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取决于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能否正确评价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学术价值，可以检验研究者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和科学合理，它直接关系到如何正视中国历史，怎样看待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古典文献是 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地域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着各民族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各民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周边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因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又不孤立绝缘。就外部关系来说，它和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文化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就内部关系来说，它又是由若干文化领域的子系统构成的。因此，任何一部民族古典文献，无论属于何种类型，都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其他学科文献之间必然存在不同层次的联系。各民族的古典文献之间既有一些共同成分，也有许多不同的内容，更有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正因为如此，各民族古典文献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各个方面。有些民族古典文献所记载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成就不仅在我国各民族中产生影响，甚至对我国周边国家的民族也产生了影响。以《格萨尔王传》为例，这部史诗作为古典文献传世，在国内外影响较大者为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的版本。当年在北京用木刻出版了七章本蒙文《格萨尔可汗传》，从那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蒙文版的《格萨尔可汗传》流传于广大蒙古族聚居区，国外则流传于蒙古国、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藏文版《格萨尔王传》在国内广大藏族地区以及土族、纳西族等地区流传，国外则流传于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对诸多民族和广大地区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各种民族文字保存下来的文献古籍，是各民族创业和发达的历史记录，是作为事实见证的最确切的历史档案。我们从古代汉文文献中知道，春秋时代有南方壮侗语族著名的《越人歌》，汉代有藏缅语族的《白狼王歌》，北朝时有出于鲜卑人斛律金之口的《敕勒歌》。《敕勒歌》原文无存，但其汉译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至今仍脍炙人口，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但这些诗歌过于短小、零散，无法使人看到古代少数民族在文学上的贡献。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上，人们不知道有焉耆—龟兹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不知道有回鹘文本和察合台文本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同样，以前学中国哲学史的人，也不知道有维吾尔族先民的著作《真理的入门》和彝族先人的著作《宇宙人文论》。民族文字古籍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广阔视野，说明少数民族的祖先与汉族先民一起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

民族古籍文献综合了各民族文化中诸多学科的知识。每种民族古籍的内容都非常丰富，涉及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科技、医学，以及民俗、语言文字等诸多学科领域。各民族古籍文献记载的内容形成各自民族文化结构的总体系，其间不同时期的记载内容，集中地体现了各个时期民族文化的总体面貌。各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总体与汉族文化总体不会是完全重合，各民族文化之间也有重大差异而各有优势，这就具备了互相取长补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以文学中的史诗这种体裁来说，各民族的情况就相当悬殊。汉族没有规模宏大的史诗，但北方少数民族有很多英雄史诗，如维吾尔族有《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英雄托斯提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藏族跨越南北，但带有较多北方民族气质，而且《格萨尔王传》也在甘肃、青海等北方地区广泛流传。《格萨尔王传》与《玛纳斯》、《江格尔》一起，作为我国三大史诗，早已列入世界名著之林。比较起来，南方民族较多创世史诗和长篇叙事诗。创世史诗在彝族有《查姆》（云南）、《勒俄特依》